

从民族团结誓词碑到民族团结柱

——访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司长武翠英

□本报记者 明江

记者:这是一本通过对代表性词汇的历史叙述与解释,生动讲述60年来少数民族在政治、社会、文化、风尚、教育、科技、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展的书,怎么想到用关键词来表现整体风貌?

武翠英:新中国的60年书写了人类历史的不朽史诗,这其中,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传奇篇章,然而60年时间跨度太大,我们如何用一本书来囊括这60年的传奇篇章?在选题策划阶段,我们有过很多次取舍,也曾考虑过诸如“60年60人物”、“60年60地方”这样的选题。最后经过大家的商议,一致同意用“物象”的方式来阐释并解读这60年来发生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身上的故事,从这些可触可感、实实在在的“物象”入手,把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事、物背后的故事发掘出来,用事实来生动形象地诠释抽象的概念和史实,力图将宏大的历史还原到一个个活生生的载体上。通过对这些人选“物象”的叙述、解读,记录各族民众和祖国风雨同舟的历史征程;以“物象”的经历折射民族及国家的命运,彰显“三个离不开”和“两个共同”的时代主题。

记者:“和而不同”的理念如何通过这本书来体现?

武翠英:费孝通在他80岁的生日宴会上展望人类的前景时说了4句话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际上阐述的就是“和而不同”的概念。

费老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天与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个“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各民族相处时,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承认不同,但是要“和”,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在瞬间毁灭掉自身。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乃至个性,56个民族是不同的,但是正因为这些“不同”,中华民族才能拥有如此璀璨丰富的多元文化。“和而不同”其实就是“多元互补”。而“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就这样很自然地成为本书的中心思想,贯穿始终。这本书的书名“和而不同”四个字是由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同志写的。

在挖掘一个个“物象”背后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其实正是在书写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有着一致的和谐关系。

记者:该书共分为4个篇章,“政治·社会”篇、“文化·风尚”篇、“教育·科技”篇、“经济·生活”篇,在每篇里多则近百个关键词,少则十几个关键词,在这几个不同的篇章,关键词的选择上是怎么考虑的?

武翠英:在选取物象的时候,我们是有自己的标准的:首先,该物象必须是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息息相关的;其次,该物象必须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代表性,比如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这个“第一”就说明了它的代表性。还有牛街,可能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穆斯林聚居区,但是北京的牛街在全国的穆斯林心目中是非常有分量,而且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地方;再次,该物象必须能够以小见大,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去解读物象本身,而是通过它,去挖掘其背后更加深刻、更为生动的历史故事。

记者:这本书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很多文章都以鲜为人知的民族故事展开,让人形象地感受到岁月给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

武翠英:这本书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推出的一本书,它的政治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忽略了文章本身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民族团结杂志社的编辑为此书花费的心血和付出的辛劳。为了兼顾政治性和可读性,全体采编人员共同努力,几易其稿,始终精益求精。

这本书的每个故事都是精选出来的,都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本书真实、客观地再现了我国少数民族举世瞩目的进步和民族工作波澜壮阔的历程,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和民族关系翻天覆地的巨变,声声并茂地把中华各族儿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精神风貌呈现于世界面前,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它的意义更为凸显。

记者:这本书选取的物象很有意思,比如从民族团结誓词碑、民族团结宝鼎到民族团结柱,比如从《刘三姐》到《印象·刘三姐》,“《北京的金山上》”、“《青藏高原》”、“从歌圩到南宁民歌节”等等,这样的选取怎么考虑的?

武翠英:关于对比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既是我们的编辑精心考虑和设计的,又是很自然而然产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你提到的这几个物象为例,好像都属于文化范畴内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精品——文学、艺术、电影、歌曲、舞蹈等方面的精品陆续被创作出来,比如电影《刘三姐》、《农奴》、歌曲《北京的金山上》等等,都是

由民族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和而不同——民族工作物象解读》是一本以物象即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关键词来解读新中国60年民族工作的著作,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中国民族》杂志联合编写,在精心选择的诸多关键词的解读背后,60年来新中国少数民族举世瞩目的进步和发展以生动鲜活且具有代表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

如何讲述60年来少数民族发展历程的伟大故事,如何真实客观地再现少数民族工作的进步历程,如何描绘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和民族文化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何向世人阐释“和而不同、齐心协力”处理民族问题的“中国模式”,这本书作了创新性的探索。本书的出版受到了专家、学者、民族工作者及很多读者的好评。记者近日采访了该书的主编、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司长武翠英,就这本书的创意、编辑及民族工作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



方;再次,该物象必须能够以小见大,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去解读物象本身,而是通过它,去挖掘其背后更加深刻、更为生动的历史故事。

记者:这本书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很多文章都以鲜为人知的民族故事展开,让人形象地感受到岁月给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

武翠英:这本书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推出的一本书,它的政治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忽略了文章本身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民族团结杂志社的编辑为此书花费的心血和付出的辛劳。为了兼顾政治性和可读性,全体采编人员共同努力,几易其稿,始终精益求精。

这本书的每个故事都是精选出来的,都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本书真实、客观地再现了我国少数民族举世瞩目的进步和民族工作波澜壮阔的历程,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和民族关系翻天覆地的巨变,声声并茂地把中华各族儿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精神风貌呈现于世界面前,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它的意义更为凸显。

记者:这本书选取的物象很有意思,比如从民族团结誓词碑、民族团结宝鼎到民族团结柱,比如从《刘三姐》到《印象·刘三姐》,“《北京的金山上》”、“《青藏高原》”、“从歌圩到南宁民歌节”等等,这样的选取怎么考虑的?

武翠英:关于对比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既是我们的编辑精心考虑和设计的,又是很自然而然产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你提到的这几个物象为例,好像都属于文化范畴内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精品——文学、艺术、电影、歌曲、舞蹈等方面的精品陆续被创作出来,比如电影《刘三姐》、《农奴》、歌曲《北京的金山上》等等,都是

脍炙人口的,其知名度与今天所谓的大片、流行歌曲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可以问问你的长辈,在他们那个年纪,有谁没有把《刘三姐》《五朵金花》反复看过几遍的?又有谁不会唱《北京的金山上》《阿佤人民唱新歌》?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流行文化的进入,曾经活跃在我国主流文化舞台上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很大冲击。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多元文化浪潮的兴起,人们重新将关注的目光投注到拥有丰富元素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之上,比如著名导演张艺谋将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事重新演绎,与桂林的自然美景相结合,创造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这一视觉盛宴,同时,也将刘三姐这一少数民族文化品牌与桂林的旅游品牌结合起来,开创了全国旅游界和商业演出界的先河。

我们选取的具有对比性的物象,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比如《刘三姐》和《印象·刘三姐》,它们都借用了壮族歌仙刘三姐这一品牌元素;《北京的金山上》和《青藏高原》,这两首歌都是藏族题材的,而且《北京的金山上》的演唱者雍西与演唱《青藏高原》的藏族女歌手韩红还是母女。这些内在的联系经过我们的精心编辑被发掘出来,用对比的方式,既能让同一类的题材相得益彰,又能更好地反映60年民族工作方方面面的变迁。其中的历史感穿越时空的距离,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以当下追忆往昔,以往昔映衬当下。

记者:书中写了很多人们印象中的经典,比如西藏民族改革第一村、草原英雄小姐妹、“援藏”“援疆”等等,更有具有时尚感的天仙妹妹、藏文手机等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词选取上,有什么样的考虑?

武翠英:在选择方面,基本上我们针对每一个阶段中民族工作的大事、要点都精心选取了相应的物象来呈现。这些物象,涵盖了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风尚、教育、生活、科技等诸多方面,每一个物象都能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缩影。当然,类似的物象还可以挑选出很多,我们在挑选物象的时候,尽量把知名度较高、具有代表性的挑选出来,不过遗漏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指正批评。

至于今后是否还有相关的书籍出版,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是行使为民族文化工作服务的政府职能的,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推动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像类似《和而不同——民族工作物象解读》这一类的书籍,我们不仅今后要继续出,还要多出,形成精品。

记者:这本书读到很多文化内容,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是60年民族工作成就的重要体现,请您谈谈今后应重点在哪些方面保护和发

展少数民族文化。

武翠英: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2009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这对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将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建设:一是抓好文化设施、文化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场所、阵地和人才,重点培养传统文化传承人,推出一批文化精英;二是抢救和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争取把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特别是濒临消失的遗产列入各级政府的保护计划进行有计划的抢救和保护;三是打造文化精品,通过各种激励机制,努力推出更多像《刘三姐》《五朵金花》《北京的金山上》和《草原夜色美》等风靡全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化精品;四是努力将民族文化的特色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不断提升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当前,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正面临一个难得的好机遇,也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我们热切希望社会各界包括媒体进一步关心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共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

记者:这本书展示了民族团结和进步的巨大成就,您认为,民族团结和进步如何具体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武翠英:这个问题问得好。的确,阅读这本书,你会为60年民族团结和进步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甚至内心感动不已。书中的每一个物象,从年代最近的天安门矗立的56根民族团结柱到历史最久远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云南普洱县城竖立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整整一个甲子的时间跨度,我们从极度贫困到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经济实体,中华儿女一同书写了这人类历史上不朽的史诗,其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变化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如果让我在这里概括的话,我只能说变化是全面的、巨大的、深刻的。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60年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的故事,请你打开这本书仔细看看,也希望你能到民族地区多走走看看,相信你会和我一样,为我们统一多民族的祖国而骄傲,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巨大成就而自豪。

少数民族显然有着更多情感的纠葛与无奈,以及掩不住的倾诉欲望。遭遇洪流滚滚的趋同文化,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但似乎也是登上了同一辆列车,他们的作品证实了某种貌似平静,不能不接受的真实,同时又力图再现独特的民族文化,提升弥足珍贵的民族精神。

的确,如同潜藏在这些蒙古人身体血液中的密码一样,潜藏在他们文字里的民族气息依然扑面而来。文化悠久的蒙古族在历史上曾有过无数次与其他民族的交汇融合,他们在包容拓展的同时,从容地保留着自己民族独有的文化脉络,以及特别富有音律和表现力的语言文字。这些,我们可以在经典的《蒙古秘史》中读到,也可在当代蒙古族作家的作品中读到,眼下,80后的蒙古族年轻作家们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草原、库布其沙漠、辽河、牧人,那些并没有淡去的风景带着蒙古民族的骨感苍茫而又高远。

从网络上,我们可以见到一群80后的文学宣言:“我们需要探索,我们需要沉淀,我们更需要特立独行的思索。”显然,80后文学给予文坛的冲击波还远没有结束。当下,也许是一次浪潮的开始,随着多元化的中国文学不断繁荣,少数民族的80后将会在以后的岁月里吸引更多人的目光,他们将会创作更加耀眼、风光独具的文学精品。

两会声音

“建立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长效机制”

“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创造经济奇迹,也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文化辉煌”,“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两点,让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备受鼓舞,不少代表委员就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积极建言献策——

蒙古族人大代表朝鲁孟:在一些旅游景点、大型饭店,作为蒙古族文化品牌的长调民歌俨然成了“劝酒歌”。虽然旅游景点上的长调民歌表演,为不少蒙古族群众提供了饭碗,但那些唱法不规范,没有按照标准的演唱形式会影响长调民歌的原生态传承。一个民族,特别是像鄂温克族这样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必须要原汁原味,为了让更多的人熟悉而肆意篡改,会得不偿失。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长吴家权: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但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还是面临不少问题,主要还是投入不足的问题。民族地区多是贫困地区,缺少保护民族文化的资金。农民的精神文化投入不足,就容易出现赌博、封建迷信等现象。对民族地区文化的保护关键还是建立长效的投入机制问题。

鄂伦春族孟玉珍: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正在申请建设鄂伦春民族文化自然保护区,我们如果得到批准建设这个文化保护区,就会面临怎样合理利用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民族文化旅游或民俗旅游,既要保持原生态,又要满足游客的需求,这个度其实不好把握。民俗村的生活越来越宾馆化、程式化,原生态的味道就会淡去。一些地方要搞民俗旅游,应该让民俗专家为其整体把脉,不要一味地考虑经济效益而改变民族文化的特性。比如某个祭祀仪式,按照传统一年只能搞一次,但为了吸引游客每天或每月都进行一次,势必使传统民族文化“变味”。可以根据少数民族风俗、禁忌,明确哪些民族文化项目可以开发,哪些严禁商业开发。

新疆舞蹈家协会主席迪丽娜尔·阿不都拉:作为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我去过许多民族地区,目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主要靠农家乐、蒙古包等形式开发“原生态”文化,这有利于农牧民脱贫致富,但大规模、低层次的粗放式开发又将损害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长期利益。

哈萨克族新疆海县县长库丽努·努尔哈力:哈萨克族是一种叙事长诗,由哈萨克族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受到哈萨克族老老少少的喜爱。现在,哈萨克族留下来的共有250多部,而会的大多是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且没有任何文字、影像资料,不考虑传承,再过一两代,这个文化有可能失传。两年前,哈萨克族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海县就加大保护行动,记录谱,但要把这些内容制作成书或影像资料,经费确实有些困难。建议成立“少数民族濒危遗产抢救基金”,建立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长效机制。

鄂温克族委员杜梅:寻找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点,就应该尽快建立相应的开发利用与科学弘扬的机制,让法律保障体系的建设逐步规范化,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的意识,不要把“利用”当成“重视”。

锡伯族代表富春丽:我们建立了民族民俗博物馆,发展民俗文化和特色旅游,但是忽略了民族文化本质的语言和文字,我们的锡伯族语言正在慢慢消失。锡伯语有134个字母,也有相应的锡伯族歌曲,但是现在很多锡伯族人都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会写的人就更少了。

鄂温克族代表朝克: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少专家学者的理论指导,缺少有力而科学的抢救手段与保护方法,再加上缺少专项保护资金,使那些濒危民族语言和优秀口头传统文学很难得到保护和抢救。

京族代表苏明芳: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但是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服装、语言、音乐等文化呈现出逐步消逝的趋势。以京族为例,除了“嗵字”以外,京族特有的民族乐器独弦琴也有待发掘、抢救、归纳、入库,并进一步分析、整理。保护好跨境少数民族的文化有利于加强边疆地区文化建设,发挥少数民族人文优势,促进和谐周边环境建设,维护边疆稳定和地区文化安全。

单霁翔等委员: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22个民族的人口在10万以下,有的不足5000人。由于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核心区范围较小,存续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身能力较弱,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更加令人堪忧。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较少民族面临着比其他民族更严峻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渴求经济上高速发展,尽快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希望长久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脉,担忧民族传统文化的急速消失。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国家有关部门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紧迫课题。

建议:一、设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加大抢救保护经费支持的力度。二、优先立项支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博物馆建设。按照“逐步实现每个民族拥有1个以上的民族民俗博物馆”的目标,优先支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建设收藏、研究、展示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三、认真总结在民族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成功经验,统筹规划22个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本报综合)

本版责编:明江

主编第一视角

80后,蒙古族新一代文学话语

□叶梅(土家族)

早在十多年前,80后文学就已经风生水起。有人认为是“80后”作为青春文学的表现,早期停留在自我的迷恋,是泛审美时代的颓废与虚无之花;还有人认为80后文学的热闹是因为文化消费与商业炒作的结果,意味着文学偶像化、商业化时代的进一步来临。可无论怎样众说纷纭,80后文学无疑是新世纪历史语境下重要的文学浪潮之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早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说及。事实上,80后文学的兴起应是势所必然,众声喧哗之中,80后文学以越来越昂扬的形象向前跃动。而在此之前,尚未引起人们关注的少数民族80后创作也正在悄然兴起,民族文学新近推出的“蒙古族80后作品专号”(2010年第4期)就是一个实证。

木琼尔、陈萨日娜、查黑尔特木日、赵吉雅、金达、扎·哈达、周静、新醒博、呼·布和满都拉、欧其尔加甫·台文、桑杰、照日格图、苏笑嫣等,对于文坛来说,这些年轻人的名字尚

且陌生,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国家级文学刊物上正式亮相,但却有着深长的意味,让我们聆听到一个古老民族新一代的文学话语。

作为蒙古族的80后文学,与其他民族的80后一样,杂糅着叛逆、感伤、多元,由关注自我逐渐延伸到思考社会。木琼尔的中篇小说《雏凤清声》中表现了母女之间不可抹去的代沟,妈妈木木是个理想主义者,凡事都追求完美,但处于青春期的女儿根本就不以为然,她在工作、爱情等一系列问题上反抗着“不听林木言,吃亏在眼前”的教诲,但又始终和妈妈欲远还近,亲密却有间,细节和语言生动幽默,富有情趣。陈萨日娜的小说《情缘》在叙述几个年轻人爱情纠葛的同时,贴切地表现了当下蒙古族的生活及情感方式。新一代走进校园和城市的风景,多元的选择让人眼花缭乱,“有情歌,有爱语,有礼鲁特,乌珠穆沁的摄影……”草原的女儿在探索中梦想成真。

还有赵吉雅的《片片枫叶情》,金达的《503号宿舍》,扎·哈达的《我的女老板》,从不同的生活场景中摄取了80后求学、生存的各种画面,富有象征意味地定格在“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依旧非常热闹”、“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的境况中。表达了80后所经受的磨砺,在困惑和追问中的成长,让我们对蒙古族新一代的生活有了多彩的解读。

查黑尔特木日是一位用母语写作的年轻人,他的小说《巴拉嘎河边的故事》(哈森翻译)描写了一群大学生,怀着“忘了祖宗,失去良知只认钱,这些人在闪光的蒙古族历史长河中渺小如蚊蚋”的认知,自觉保护民族历史文物,鄙视金钱至上,反映了新一代蒙古青年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在呼·布和满都拉、欧其尔加甫·台文、桑杰、周静等人的散文中,我们读到《往事飘过河流》《忽必烈狩猎》《我在秋天洗涤着思绪》《羁不住的心》等篇章,面对全球化和都市化带来的文化趋同,